

其万事万物的本真本然。例如,当代最负盛名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在提出“宇宙大爆炸”理论时,就与道家“有生于无”的思想碰头了。这表明,现代最前沿的物理学家也在本真本然上把宇宙看成是非实体性的。

象思维之“象”,就其本真本然而言,就是“大象无形”之“象”,或“无物之象”。这种作为“道”之“象”的“原象”在思中所开辟的,既是大视野,也是高境界。从象的意义上说,进达这种大视野和高境界的“原象”境域,也只能从与实际生活经验相联系的具象和意象起步,或者说是借此向神思的“原象”过渡。这种过渡在对庖丁解牛得“道”过程的描述中,庄子写得很生动:“始臣之解牛之时,所见无非全牛者。三年之后,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,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,官知止而神欲行。”(《庄子·养生主》)不难看出,庖丁从“见全牛”到“未见全牛”,再到“官知止而神欲行”这个过程,正是从具象、意象到“大象无形”的“象思维”过程。“官知止而神欲行”,就是思超越具象、意象而跃升至“大象无形”之“原象”境域,也即得“道”之境域。

这里所谓“大象无形”的“原象”,就其本真本然而言,就是“有生于无”的“无”。这个“大象”之“无”,除了无所不在、无所不包,更重要的还在于,它是原创原生之源。因此,思与精神只有跃升至这种“无”的高境界,获得这样的大视野,才能真正进入庄子所说的“无待”那种理想的自由之境域,也才能焕发出无限的创造生机。思在“无”这种巅峰境界和视野下,原来在概念思维中被切割而失去本真本然状态的宇宙万事万物,就能恢复其本真本然状态了。庄子所说的,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,就是这种恢复本真本然的表述。所谓天、地、人(我)“三才”之“并生”,也就是“三才”一体贯通。而所谓“万物与我为一”,则是把这种一体贯通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刻化。同时,这种“无”作为思和精神回归“原发创生”的终极之所,不仅中止了概念思维,超越了对象化的主客二元思维模式,而且也超越了感知之象(嗅、听、视、味、触之象)。“无”作为终极之所,可以说既混沌未开,又虚灵至极。所以,这个“无”在思和精神上隐藏着无限创造的生机。只有借助“象思维”,才能将这无限生机开启出来。老子所

说的“常无，欲以观其妙”，其“妙”就“妙”在能在思和精神上开启无限的创造生机。

“象思维”所蕴含的“象的流动与转化”，经过具象、意象诸可感知之象，进而跃升至“大象无形”之象或“无物之象”，都与老子所说的“观”以及《易传》所说的“仰观天文”之“观”相关联。在这里，对可感知之象的“观”，与超越这种“观”的“大象无形”或“原象”之“观”，此两者具有原则的区别。前一种“观”，是视象、声象、嗅象、味象、触象之“观”，以及这些象变形（如记忆或梦境）之“观”。这些可感知象之“观”，虽然也具有启迪思和精神创造之价值，但是，由于这些“观”都是“有待”之观，就是说，还受到这些可感知之象的束缚和局限；所以，这些象之“观”，还远不能与“观其妙”之“观”相比。后一种“观”作为“观其妙”之“观”，是“大象无形”或“原象”之“观”，就是说，是“无待”之“观”，或能做到如禅宗所说“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内外不迷”（《坛经》，敦煌本，第四十二），也即进入思和精神完全自由的境域。因而，只有这种“观”能开启无限的创造生机。如果说到“原象”与可感知之“象”的关系，那么除了要明确两者的区别，还要看到两者的联系。那就是，对“原象”的把握，只能在一步步“悬置”可感知之象时才能体悟到。反过来说，可感知之象也是“原象”的表现，既是显示又是遮蔽“原象”的表现。

如果承认概念思维与“象思维”的根本区别在于，概念思维诉诸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模式，而“象思维”则诉诸“物我两忘”即回归“本真之我”而与“道”一体相通，或简言之，诉诸整体直观的非对象化思维模式，那么，由此必然引出两种思维模式更深刻的运作区别。概念思维涉及主体的，主要是认识之理，并不涉及主体境界如何。而“象思维”则在求悟中不仅思理，而且要提升境界，其深邃之理往往就寓于诗意盎然的境界之中。因此，象思维不仅需要思理的认识功夫，而且需要有更重要的“体道”功夫。事实上，“体道”的功夫是决定一切的。特别是，这种“体道”功夫在提升境界过程中所带来的“受用”，更是概念思维所不知道的，或者说是“象思维”所独有的。前述领悟“体”与“观”时，已经对这种“功夫”与“受用”有所显示。“功夫”用今

天的话说,就是一种付出,一种“体道”的精神付出。而所谓“受用”就是一种付出得到的结果,一种“得道”而提升的境界。在前引庖丁解牛中,已经显示出不同的境界。其中关于进入“得道”境界的“受用”,庄子是这样描述的:庖丁“提刀而立,为之四顾,为之踌躇满志”。寥寥三句话,把“得道”的高境——自由自在的“受用”,描述得活灵活现。此外,庄子对女偶教人“得道”的描述,更是把这种“功夫”和“受用”表述得出神入化。女偶对所教之人“得道”是这样描述的:“吾犹告而守之,三日而后能外天下;已外天下矣,吾又守之,七日而后能外物;已外物矣,吾又守之,九日而后能外生,已外生矣,而后能朝彻;朝彻而后能见独;见独而后能无古今,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”(《庄子·大宗师》)从“功夫”和“受用”的角度看,这里把不同境界的不同“功夫”与“受用”,用象征和寓言的手法表述得异常生动而又深刻,给人以无穷的回味。当然,庄子借此所提出的问题,决不限于“功夫”与“受用”。其中,“三日、七日、九日”所提出的是时间性问题,以及所谓“外天下”、“外物”、“外生”、“朝彻”、“见独”、“无古今”、“不死不生”,都是与回归“本真之我”相关的重要问题。此处主要讨论“功夫”与“受用”,上述与回归“本真之我”相关的问题,将在有关庄子的篇章中展开。

二 守护生命之根

老子“知其白,守其黑”的思想,受到海德格尔的特别重视;或者说,老子这一思想给海氏以重要启迪。后期,海德格尔在论说“祛蔽”的“存在”意义同时,也揭示出“遮蔽”的重要意义。海氏思想的这一发展,与海氏在此中受到老子的启发,有密切关系。在海氏看来,作为“黑”的“遮蔽”,不仅是“祛蔽”和“澄明”的条件,而且这个“黑”之“遮蔽”还蕴含着需要守护的使人自身得以“存在”的根基。实际上,海德格尔后期反复吟颂的天、地、神、人四位一体,其中天、地、神都有作为“黑”的“遮蔽”底蕴。正是这种底蕴,是人自身得以“存在”并需要守护的根基。可见,对于天、地、神具有作为“黑”的“遮蔽”底蕴,不仅不能

完全“祛蔽”，而且需要特别的守护。否则，这种作为生命之根的底蕴完全裸露，生命就必然枯死。即使是人，作为与天、地、神四位一体之一，也有需要守护的“遮蔽”之底蕴。如果把海德格尔的“四位一体”与老子“宇中四大”相比，那么可以看到，海氏“神”的位置，在老子那里则是“道”。老子有“道法自然”之解说。海氏的“神”法什么？“神”法“自身缘构发生”(Ereignis)吗？在海氏那里，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。因为，他在评价诗人作为“寻找神迹的人”时，明确而又悲观地指出“诸神已经远去”。他由此认为，人类已经落入没有神灵光亮的黑夜深谷，并且至今还未到谷底。在这里，海氏所说的“诸神已经远去”，与老子所说的“道法自然”，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海氏所说的寓意，不过是对无限制“祛蔽”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之深刻揭示，是对概念思维方式下产生的“科技失控”这种异化所作的哲学批判。而老子的“道法自然”，则是从正面肯定“遮蔽”的重要意义。因为“遮蔽”在根本上也是一种“自然”。所以，“道法自然”也不能不包括“道法”“遮蔽”这种“自然”了。

从“守其黑”蕴含着守护人得以“存在”根基的视角出发，再来看庄子关于“浑沌”帝之死的寓言，其悲剧的警示意义，就更见其重大深远而具有震撼力。“浑沌”帝寓言，从“道法自然”的视角看，是指“浑沌”为一种“自然”之态，生命“存在”之态。因此，必须守护之。而“儵、忽”二帝的“善意”即使之变成像人一样，具有七窍。结果，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死。这表明，“遮蔽”的“自然”之态作为生命之态，只可守护，不可违反。此外，“浑沌”这种“遮蔽”的“自然”之态，其深层意义还在于，它是原发之“道”，即老子所说的“道隐无名，朴”。或者说，“浑沌”是隐身的“道”，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，即更深层的“道”。可以说，海德格尔所谓“天、地、神、人”四位一体之奥义，都在这种隐身的“浑沌”之“道”中。“浑沌”帝被“凿窍”的深刻寓意在于，这种“凿窍”乃是人类生存和精神发展的一种悖论。在人类文明发展中，从开始对自然和人身自身逐渐认识的“凿窍”，特别是现代以来，崇尚以人为本而利用科技等各种手段所作的开发，不能不说都是人类生存和精神发展的必需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由于人类欲壑难填而做的无限制的“凿窍”，致使当